

杜甫印象，抑或印象杜甫？

王曦

杜甫的诗和人，都是令人难以靠近的。他出身望族，婚配名门，三十岁之前的人生多么无忧无虑，骑马射箭、云游四方，看过公孙大娘的剑舞，听过李龟年的歌声……早年的经历奠定了他的审美高度和生命宽度。伟大的诗人，生活历程是一个整体，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诗与思是两面皮，仅凭格律无法行走天下。杜甫早年云游四方，晚年迁徙不停，杜甫不长的59岁生命，浓缩了丰富的人生苦难，也酿出了丰厚的诗篇。他的诗歌，是思，也是史。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舞剧《杜甫》以“一个人笔下的唐朝”为题是准确的。编导意欲将杜甫投射在历史的大时代、大背景之中，但被空投进大时代的“杜甫”和“另一个杜甫”，凭借什么站立起来？历史中的杜甫怎样成为舞台上的杜甫，编导心中的杜甫怎样成为演员身上的杜甫？根据时间线索去围合，还是通过故事叙事去架构？

显然，编导有意想要做一个实验。而且，在我看来，这是“印象派”的实验。常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杜甫，其实有着丰富的通感资源，印象、感觉和追忆连绵，下笔即成画面，生活困顿，精神广阔，写出了人类经历过苦难的痕迹，可谓是印象派的诗人。编导抓住了杜甫这个复杂生命体的艺术特征，成为艺术创作的养料，源源不断地输送给舞台和舞者。

舞台人物被极度简化，没有好友李白，忘年交李邕，晚年的精神陪伴高适、岑参，有的是“权”，暗喻着李林甫、杨国忠以及众多给杜甫造成人生挤压的达官显贵；有“妃”，暗喻杨贵妃以及后宫佳丽三千；“杜甫”和“另一个杜甫”，恰好由一对双胞胎来演绎，象征着自我和本我的对话，像照镜子一样看到曾经的自己。

舞剧从“壮游羁旅”开始，经过“长安十载”，直到“弃官归隐”，最后“登高望远”，杜甫的人生被浓缩在四个画框中，通过一个个诗篇的场景表现出来，并非与历史时间严格对应。于是，我们借着杜甫的双眼看到了兵车行、丽人行，也看到了三吏三别，舞蹈语言鲜明可爱，比如长安书生蠢蠢欲动求官为名利，满朝文武鼻孔45度向上走路，水边贵妇们顾影自怜如木偶，大厦将倾之际宫女惶惶不安……都十分精彩。形式即为内容，编导和诗人一样，在努力修炼节奏的控制，有意识让舞蹈显得非常的克制。文武群臣的动作姿态透露出盛时的典范，也透露出由盛及衰的微妙前兆；贵妇的华服没有描龙绣凤大红大紫的装饰，只以极素的颜色质地显示着雍容华贵的顶端。盛极必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理，服装和舞蹈在塑造“盛”这个方面是动了脑

筋的。

不过，正因为舞蹈篇章并非对应着时间线索，就带来“印象派”特有的难题，如何让散点成为画面？点与点，需要用什么逻辑去衔接；四个部分，需要用什么结构去提拎；第一眼大感觉如何确立，最终的大印象从何处拎起……印象派不必拘束于某个具体的动作或情节，但是必须将所有的一切统领在整体的“印象”之中，给人以强烈且难以言说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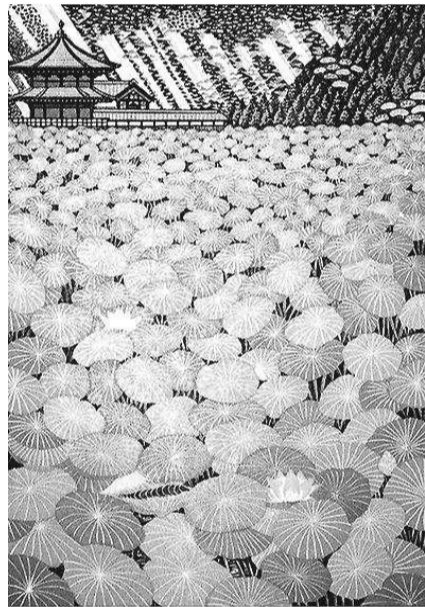
不得不说，有些舞段的生生切入，而且是带着巨大感情的切入，就像是杜甫诗歌里的“浩叹”一样，着实增加了演员的难度，也考验着观众的消化能力。比如，杜甫得知儿子饿死时的双人舞，紧接着丽人行和兵车行，前面没有出现的“妻”突然带着巨大的悲伤出现……丽人华贵，兵车寒冷，儿子可怜，三者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人间种种，来自杜甫的观察，不是鲜明的阶层对比，不是人物的矛盾冲突，但也不是简单的铺陈，这一幅幅画面是杜甫的望远镜、显微镜和透视镜。世界上有那么多可看的，杜甫为什么对这些苦难细看难忘，为什么要在自己吃不饱饭的时候还为天下人发愿？在看到了杜甫的经历之后，我们当然还希望看到他的内在驱动力，否则这样的苦难可以让人选择逃避、选择自保、选择压榨同样受苦的人，选择很多，但杜甫选择了最艰难的那一种，正面现实，初心不改，继续前行……这需要超越非凡的勇气，没有信念，没有善意，没有生存技能，如何能在重重苦难中腾挪转身？“杜甫”和“另一个杜甫”被空投进了时代背景，似乎在印象派实验中缺乏摸索的路径，无论是感情基调还是动作逻辑，都像是临时爆发的，一次性的，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上的“杜甫”。但伟大人物对凡人的影响力，恰恰在于让人了解到他曾有过的精神困惑以及如何跨越的过程，而不是他的伟大勋章。

历史上，杜甫三十岁以后的人生，起起落落，没有做过大官，连年战争，难得的喘息是因为有朋友相助，令他倍感珍惜。他绝不是因为做不到官而失望归隐，是不想做恶官。他懂采草药，会种果树，是因为贫穷，也是因为他爱生活。经历过战乱的唐朝，人口骤减，粮食歉收，杜甫一个尚有官职的人，都不能阻挡儿子饿死，何况其他的黎民百姓。所以，杜甫的哀与痛，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与天下苍生连接。可是，第二部分的低迷与第三部分欢欣的情绪对比强烈，似乎“弃官归隐”源于“长安十载”不得志。归隐生活被田耕的辛勤快乐所占据，舞台空间饱满，曾经忧国忧民的杜甫，好像“放下了”，走进了桃花源。如果杜甫的生活从此走上了安稳

平静，那是什么让杜甫的诗意在第四部分如火山一样喷发？满屏的诗句层层叠叠目不暇接，那并不是田园诗啊，而是充满了焦虑和彷徨，在细雨中呼喊一般。

杜甫客死在迁徙的航船上，因为饥饿吃了变质的食物而一命呜呼，家人无恙，他的抵抗力已经很衰弱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是在比喻这些人类群星的消逝，巨大的哀伤无法言说。那些诗篇，是杜甫之眼，自带光芒。而杜甫和其他伟大的人物一样，像夜空中最亮的那些星星，以不可估计的时间长度，向人间输送着能量。因此，杜甫是史，更是思，思想之光照亮了我们回望的这个时代，也应该照亮和引领这个舞台，四个部分之间需要以杜甫的语法互相打着招呼，跳跃过去。

杜甫是很多人的偶像。白居易读懂了他，苏轼也读懂了他，他们承前启后一路走来，拓展良知和美感的空间。“杜甫半生流离，却从未停止歌唱”，这是冯至的印象。“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这是鲁迅的印象。这都是今天我们还着迷杜甫的原因。他那密度极大的人生，可以令每个人从中获得共鸣和养分，每个粉丝都有自己的“杜甫印象”，但是仅凭喜怒哀乐，还不足以建立与杜甫的对话空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向内诉求，修炼韧性，诗与思并行，这是杜甫给我们的艺术指南。



文学精神的承载与传颂

——评话剧《历史的天空》

石俊

家与具体作品的时候才是可以被形容的，比如古希腊史诗中的神性启示，现代萨特和布莱希特的理性观照，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关于情感与幸福的联结与撕裂，以及鲁迅先生的反抗与深思。

该剧的舞美设计周丹林这样回顾自己的创作：“话剧讲述了一群满怀热情的年轻人投身抗日的故事，其中，主要人物的道路选择、情感纠葛、家国情怀、成长与转变成为了这部戏的焦点。在舞美设计上，如何表现历史的一瞬间，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我最终决定用这样一个美学概念来概括它：在舞台上铺满厚厚的落叶，象征生命的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如同置身于大别山区，在这里，生命的意义将得到诠释——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一设计妥帖地帮

助作品完成了视觉的整体呈现，也说明设计者亦统一在原著的文学精神之下。

在徐贵祥的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乡土情怀的亲切感与历史回眸的审视感。作家在获奖后表示，他最初为作品设计的地理背景是江淮，“皖西大地是被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记录着家乡人民同外来侵略、同天灾人祸、同苦难命运搏斗的艰苦卓绝的往事。皖西人民在抗战中留下了许多悲壮的故事，值得我们缅怀回味”。在创作之初，改编者、也即导演赵晶晶就带领演员来到原著的发生地安徽六安等地观察与体验，一年后更是带着剧目在金寨等地为当地驻军和群众演出，根据反馈进行调整，也让演员们在真实环境中历练与成长。

戏剧需要文学精神，需要渗

透在戏剧技巧与手段间的文学精神。这样一部有着历史的厚度与人物多维呈现的作品，需要创作者做出果断的调整。导演没有简单截取几个戏剧场面，而是选择了抗战爆发姜大牙抢亲，到解放战争初期东方闻音接应陈墨涵部起义牺牲这样一段不到十年的时间。这样的截取，在一定长度的历史时间与空间里展现人物，获得况味，我觉得是符合原作的整体形态的。从五十年里截取不到十年的时间，也避免了拉洋片般的表述与服化道的频繁切换。结束落幅在东方闻音的牺牲与梁必达的出发上，又完成了人物关系的完整建立。文学精神中有“反映论”，也有“超越论”。再现代的表达早已经是相对滞后的创作观念。在本剧的结尾，当韩秋云告诉沉浸在痛苦中的梁必达那一句东方闻音最后的遗言后，

仿佛她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就像是清晨的日出，带着红彤彤的、漂亮的云霞”。梁必达手捧鲜花上前与她携手的场景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这是与文学原著不同的艺术处理，更是对原有文学精神的再次升华。不媚上，不回避，亦不执拗。话剧在有限的时空张扬了一代军人的成长，也反思了一些伪善革命者的内心欲望与危险。这样的过程让创作者和观众再次借助剧场空间进行生命与历史经验的交会。舞台是明亮的，观众席是黑暗的，沉浸的，这样的交会会带来共鸣也会产生思考。

文学精神与戏剧精神融合，体验战争与舞台演出一起熔炼。正如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所说：“改善人性，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精神和革命精神是一致的。

话剧《历史的天空》完成了这样的承载。

青 韵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艺创演系演出的话剧《历史的天空》改编自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这部戏虽是该校14级毕业大戏，且大多数演员为本科二、三年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但演出时在观众中引发了反响与热议。这种反响与热议，与作品创作与演出过程体现出的对原著文学精神的承载与升华不无关系。

小说《历史的天空》由作家徐贵祥创作，后经过导演高希希搬上荧屏，为数以千万计的观众所熟悉与喜爱。话剧的舞台呈现基本上延续了原小说的叙事风格和主题思想，将文字刻画的人物与场景变成了舞台上营造的具体空间与人物，并内在继承了原作的文学内涵与精神。

关于《历史的天空》的小说与电视剧的评价，在十多年前已有很多专业评价，认为其开拓了新时期抗战文学的叙事模式，在主人公梁必达与其他人物的塑造上打破了过去革命文学“二元对立”的模式，颇多精彩又颇多感受。这样的感受是真切的，却又是难以具体形容的。文学精神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在研究具体作